

# 落地轉譯

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

王智明  
著

10  
ANNIVERSARY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著作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 落地轉譯

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

王智明  
著

聯經出版公司  
編輯委員會

王汎森(主任委員)

何寄澎、林載爵、楊儒賓

廖咸浩、錢永祥、蕭高彥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目次

緒論	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外文研究與殖民現代性	9
	從建制史到思想史：方法與材料	17
	「文學」與殖民現代性：理論	24
	「文學」與殖民現代性：歷史	31
	三源匯流：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	39
<b>第一部分 「外國文學」的移入與轉化</b>		
	前言	49
第一章	西學東漸：外文研究的源起與建制	51
	機構的建立：從教會學校、同文館到京師大學堂	55
	民初大學外文系的發展與變化	64
	語文各分、中外合併？：課程設置的爭議	72
	溝通中外：思想翻譯與新造文學	78
	自由普世：吳宓藏書中的人文國際主義	86
第二章	比較的幽靈：帝國大學時代的西洋文學講座	99
	「樹立帝國學術上的權威於新領土上」	107
	西洋文學的移入：倫敦、東京而臺北	128
	殖民之內外：外國文學研究與外地文學論	136
	歌謠、俚語、蒼蠅和山水：蘇維熊的「自然文學」	145
	比較的幽靈：顛倒的望遠鏡	151

## 第二部分 冷戰分斷：（新）人文主義的流轉

前言	155
<b>第三章 反浪漫主義：夏濟安的文學與政治</b>	157
戰後知識狀況：美援文藝體制與臺大外文系	162
只是「朱顏改」：現代化、在地化、比較化	172
文學與政治：夏濟安的「反浪漫主義」	182
從匪情研究到現代中國研究：「中共詞彙研究」與《黑暗的閘門》	195
餘論：文學的使命	203
<b>第四章 從文學革命到文化冷戰：侯健與新人文主義的兩岸軌跡</b>	205
冷戰與比較文學：方法的思考	208
文學與人生：侯健的位置	219
比較文學與中國傳統	226
「五四」紀念的政治：文學革命與思想戰	230
分斷的現在	241
<b>第五章 冷戰人文主義：顏元叔及其批評實踐</b>	247
「不規範」的時代：臺大外文系課程改革	249
爭議中的顏元叔：四場論戰與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化	256
再探新批評：冷戰與人文主義的跨國譜系	262
冷戰的制約與抵抗：社會寫實文學的理論與實踐	271
「一切從反西方開始」：歐美研究的原點	279
懷念與致敬	284

### 第三部分 理論年代：外文研究與後冷戰形構

前言	289
<b>第六章 創造「主體性」：理論的轉譯與落地</b>	291
理論的引介：以臺大外文系為座標	298
理論的轉譯：「空白主體」與「身分危機」	316
理論的落地：千禧年後	326
臺灣理論的可能：欲望、不滿與焦慮	331
理論之後：朝向基進的想像	340
<b>第七章 重新接合與表述：文化研究的冒現與情感</b>	345
接合／表述（articulation）：文化研究的源起	350
多重的建制史I：以《當代》和《島嶼邊緣》為線索	360
多重的建制史II：學會與學刊的成立和變化	374
理論的接合：「番易」與「逐譯」現代性的思想重構	381
情感的表述：罔兩作為方法	387
美學製造的差異：不自由的人文主義	396
<b>第八章 外文「之外」：族裔研究與相關性的追索</b>	399
多重關係性	403
「利基」！：書目、故事和體制	407
他者的樣貌：膚色、離散與地理	417
「遠處的文學」：傳會的誘惑與限制	430
傳會的誤區：「黑命關天」與亞美研究	436
後／冷戰的挑戰：知識生產的地緣政治與種族邏輯	442
<b>結語 讀外文系的人</b>	447

誌謝 .....	461
附錄 外文系所「族裔研究」碩博士論文清單（2000-2020） .....	465
徵引書目 .....	507
索引詞條 .....	56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圖目次

圖1	西南大學宬園一景	90
圖2	吳宬舊居陳列室	91
圖3	「人人文庫」1913年版本的《伊索寓言》	95
圖4	「地球版」世界文學史商標	96
圖5	蘇維熊白話詩作〈春夜恨〉與〈啞口詩人〉	102
圖6	蘇維熊《英詩韻律學》	106
圖7	《蘇維熊文集》封面	147
圖8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書封	160
圖9	朱立民與顏元叔	173
圖10	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發起書	177
圖11	侯健《文學與人生》封面	222
圖12	顏元叔	284
圖13	《天下雜誌》1992年特刊封面	292
圖14	《島嶼邊緣》圖片：施明德	363
圖15	《島嶼邊緣》圖片：白冰冰	363
圖16	《島嶼邊緣》圖片：尊龍	363
圖17	《島嶼邊緣》「假台灣人」專輯封面圖片	369
圖18	《南方》創刊號目錄	371
圖19	1989年中研院歐美所會議紀錄	416

## 表目次

表1	1913年教育部大學規程中的文學門分類與授課內容	63
表2	1934年和1937年聖約翰大學英文學科課程對照表	65
表3	1931-1939年臺北帝大文政學部英文科畢業生名單	119
表4	臺北帝大文政學部英文學專攻畢業論文清單	120
表5	理論—文化研究—歐美文學課程變化	305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緒論

# 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 外文研究與殖民現代性

想要學好一國的文學，非誦讀該國文學傳統裏的經典之作不可；甚至我們認為，想要學好一國的語言，也必須誦讀該國文學傳統裏的經典之作。文學和語言是累積的傳統，一點一滴匯集成川；文學和語言只有演進，沒有突變——此文學和語言不同於自然科學之所在。職是之故，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所有學生，無論志在文學研究，語言實用，或語文教學，都必須學習「深奧的古典英文」。惟有扎根於古典，始能開花於現代；惟有浸淫於經典文學的文字技巧，始能在使用和翻譯當代語言的時候左右逢源，瀟灑自如。

——楊牧（1977: 159）

1976年4月16日，《中國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論革新英文系與文藝教育——增益精神建設投資的先聲〉。<sup>1</sup>該文批評外文系課程的編排「每與時代的需要與氣氛絕緣」，應該加重現代英文的比重，以培養口譯與導遊人才以及中學師資為要，而不必學習「深奧的古典英文」。已故詩人，也是外文學者的楊牧為此寫了一篇短文回應，於5月2日的《聯合報》上發表，題目就叫〈外文系是幹甚麼的？〉，後來收錄在《柏克萊精神》這本書裡。<sup>2</sup>楊牧指

- 
- 1 本章前身，〈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外文學門」歷史化初探〉，2012年於《中外文學》出版時，將這篇社論誤植為在《中央日報》上發表。查證不實，甚為汗顏，特此更正。
  - 2 楊牧，本名王靖獻，是著名的詩人和散文家，也是外文學人和譯者。大學時，他念的是歷

出，今天外文系在實際教學和研究上以英文為主，其來有自，並未與時代脫節，而且強制學生修習中國文學史，加強現代青年的國文知識，更是「從未曾有的積極措施」。外文系不是「就業英語的補習班」，也不是「訓練高級導遊，供你『用者稱便』的地方」，因為外文系的目的是在於培養「一流的翻譯人才」，能夠溝通中外思想的優異學者和譯者，承擔在「學術文化上評介和傳承的任務」以及「興滅繼絕的使命」（1977: 160）。

面對實用主義的批評，楊牧人文主義式的辯護凸顯了幾個外文系的重要命題以及至今不斷的辯論：為什麼外文系在教學與研究上會以英文為主，歷史緣由何在？外國文學研究（以下簡稱「外文研究」）所要評介的對象與目的是什麼？語言、文學，孰輕孰重？翻譯、研究或創作，哪個才是其興滅繼絕的使命？<sup>3</sup>溝通中外的歷史條件與可能性是什麼？「外國」文學的範疇怎麼界定，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它的思想內涵與歷史形貌？究竟「外文研究」這門學科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它生產了什麼樣的知識，又承擔著什麼樣的使命？

一同收錄在《柏克萊精神》裡的，是楊牧原先發表於《中國論壇》上的一篇文章：〈人文教育即大學教育〉。在這篇文章中，楊牧強調現代大學雖然

---

史，因志趣不合，而轉讀外文，在大學時代閱讀了大量的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畢業後，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安格爾及其妻聶華苓創辦的「國際寫作計畫」創作班，獲得藝術碩士學位。之後再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比較文學，師從陳世驥，博士論文研究《詩經》。

- 3 關於外文系的定位，始終有不同的想像。除了內部有語言與文學的分隔外，自從「應用外語系」出現後，從教育部的角度來看，學習外文更多了應用與學術的差別。但從廖朝陽所寫的〈文學二（外文）學門調查計畫成果報告〉來看，外文學門的自我定位始終是文學研究的先鋒，藉著引進與發明觀念，為文學研究的更新創造條件。外文系包含不同語種的國家文學，如英語、日語、德語、法語、俄語等；從議題切入，外文學門包含英美文學、第二外語文學、女性主義、文化研究、比較文學、文學理論、世界文學、生態論述、媒介科技理論等不同的議題和範疇。蔡振興亦指出，外文學門的熱門及前瞻議題含括全球視域下的中世紀、物件研究、情感與生態研究與全球環境的連動等相關研究成果；亦有身體與主體與權力關係、媒介科技與文學研究的影響、亞美世界觀等相關題目（2016: 5）。這些多元的主題與範式反映了外文研究的多元性，也可視為外文學門積極重新定義自身的嘗試，從外國文學研究過渡到跨領域的人文學術訓練，以重新組構當代人文研究的內涵。但同時，實用主義亦衝擊著外文研究這樣的自我定位。根據潘乃欣（2019）的報導，教育部發現，臺灣大專院校外語類學生人數高峰是95學年的8.2萬人，占全體學生人數比重6.2%；到了107學年只剩6.6萬人，占全體學生人數比重5.3%。人數下滑凸顯的不只是招生問題，亦某種程度反映了社會對外文人才的想像和期待。

分科細密繁複，但是人文教育實為根本，因為西方人文教育的基礎即是對人文主義的貫徹與發揚；這個西方傳統中最为輝煌的人文精神就「相當於儒家之所謂文學，包括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文學（literature），卻又超越了文學，強調其外發的力量，所以也不是孤立的學業而已」（1976: 163）；是故「我們在倡議『文化復興』的時候，應該對於傳統文史哲的教育加以激勵，不可以任其荒蕪，更不可橫加打擊」（1976: 167）。楊牧將西方的「人文」等同於傳統的文史哲教育，強調一種貫通中外的思維以及「士以弘毅」的態度，以抵抗社會發展過度傾向技術與功利的現象，尤其當政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抗大陸「文革」之際，他更主張多以鼓勵，少予打擊。楊牧的辯護顯現人文學科的發展一直面對著來自於實用主義的挑戰，也突出文學研究與教育的目的，絕不止於內心的修養與知識的精進，而在於「弘毅」的展望，既要「負有興滅繼絕的道德使命」，又要具備「從古典中毅然走出，面對現實，不惜為降魔驅邪而戰鬥」的知識勇氣（1976: 164）。

楊牧的主張不為外文學者獨有，也因此討論外文研究的發展，其意義也不僅止於外文系的師生而已，而是關於語言政策與人文研究的總體衡平與反省。<sup>4</sup>但是，貫穿楊牧思考的自由人文主義（liberal humanism）正是民國以來外文研究發展的思想底色，亦是在政治動盪與思想解放的百年歷程中，外文學者與外文研究賴以維繫的核心價值。《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嘗試的，正是要回到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去檢視與分析隨著西方文學知識的引進、翻譯、探討與建制化，外文研究究竟如何生長、發展、流轉與變異，並在回顧當中，重新測定自身的價值與意義。換言之，本書的核心關懷是：西洋文學與思想究竟如何在落地轉譯的跨國行旅中成為我們的外文研究？這個歷史過程有何特殊的軌跡，它與當前臺灣人文的發展又有怎麼樣的關聯？

「外文學門」是國科會（現為科技部）自1970年代起，在學科架構調整的過程中逐步確立的一個學門分類，百年前並不存在。<sup>5</sup>但是作為知識生產的形

---

4 尤其在「雙語教育」將成為國策的此時，外文系肩負英語訓練，而非人文研究的印象再次被強化，這也預示了一個可能發生的場景：當外文系不再需要承擔英語教學的任務時，它該如何定位自身的教研任務？這個問題，筆者無法在此充分回答，但它確實是外文系無可迴避的挑戰。

5 目前筆者未能找到可以說明科技部學門規劃始末的文獻或檔案，僅能從國科會組織章程的變

式，它卻有一段不短的歷史可尋，上可溯及清末西式學堂與現代大學的建立、五四新文學運動和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西洋文學講座，並銜接上1949年後渡臺大陸籍學者的學術奠基工程，直至1970年代以降臺灣比較文學的發展以及解嚴前後西方理論在地操演所帶來的變貌。然而，書寫外文學門的百年發展並不容易，這不僅是因為既成的歷史研究十分有限，更是因為特定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使「臺灣」「外文研究」的實踐總在不同的知識譜系間擺盪，不易收攏。<sup>6</sup>理想上，外文研究的範疇應當涵納所有非本國的文學與文化，但真實狀況卻是「西方」文學與文化統攝了我們的外文想像；即令舊俄文學（如普希金、托爾斯泰與契訶夫等）曾是好幾代外文學人與知識青年的重要養分，但自二戰結束以來，英美文學才是臺灣外文學門的主流，輔以法、德、西等國的語言訓練與有限的文學引介；北歐、東歐、非洲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文學甚少出現，非西方語文（除了日文、韓文之外）更絕少出現在外文學門的視野裡。<sup>7</sup>同時，文學與文化研究需要語言訓練為基礎，這使得語言學和外語教學自然而然地成為外

---

化進行推測。筆者查詢立法院法律系統發現，「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組織條例」在民國61年1月11日通過；該條例的第二條明列該會職掌，共十項，但其中並沒有明定學科分類與學門規劃，只說「設六組，分掌前條所列事項，並得分科辦事」。依「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893號，政府提案2057號」的說明，這六組為自然科學及數學、工程及應用科學、生物及醫農學、人文及社會科學、科學教育及國際科學發展合作。立法院民國71年4月20日通過的組織條例，大幅修改了第二條的內容，將職掌的說明改為處室的設置，構成我們今日熟悉的學科分類的架構：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生物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以及科學教育。這個架構一直沿用至今（惟科技部架構下，科學教育被併入人文司）。就此，我們大致可以推斷，現今學門分類的架構大概是在1970年代開始醞釀，至1980年代初確定和推行。

- 6 就筆者所見，外文學者中最接近建制史研究的是陳長房（1999）與單德興（2002）的文章。張靜二主編的研究書目（2004）與研究資料叢編索引（2007），雖然在內容上鉅細靡遺，但是對外文學門的建制史並沒有具體的闡述。相較而言，歷史學者蔡明純（2006; 2011）對外文學門最早的學科建設過程則有較豐富的描述。
- 7 在國科會（現為科技部）的學門分類裡，外文學門（即文學二）共包括了日、韓、俄、德、法、西、英、美等八國文學，另加上西洋古典文學、文學文化理論以及經典譯注三項。語言學與外語教學另屬一類，不列入外文學門的範疇。文學一則包括了中文、臺文與原住民文學。近年來，在韓國流行文化以及「新南向」政策的帶動下，在大學裡，韓語與東南亞語言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選修，文學上也開始有較多的引介和譯本。東歐文學（如捷克的米蘭·昆德拉），在冷戰結束後，有較多的譯介和研究，但是當代俄國文學、非洲文學、阿拉伯文學的引介仍然十分有限。

文學門的重要元素，並且逐漸發展出各自的專業想像與學術領域。<sup>8</sup>這樣一來，「外文系」一詞所統轄的往往不只是本國文學（不論是中文、臺文或是原住民文學）之外的廣大世界，更是一個不同專業（外語教學、語言學、翻譯訓練、文學研究、文化研究、區域研究等）並置與競逐的學術機構與學科想像。當然，全球貿易與實用思維將英文視為「工具」，而不在乎其內涵的想法，也有不少的影響，並逐漸推動外文系往「應用外文」發展。這樣的多樣性一方面成就了外文系在思想訓練與教學內涵上的豐富性，但另一方面，不同的學科要求與教學理性也在學門內部與系所建制上形成張力，在拉扯中形塑著外文學門的百年風貌。

然而，外文系究竟從何而來？不同的學科範疇與專業要求又如何進入並形成了外文系的建制與想像？百年前的外文系就是今天的樣貌嗎？百年來有什麼改變與創新呢？日據時期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下的西洋文學講座呈現了什麼狀態、留下了哪些影響？它與之後的外文系又有什麼差別？外文研究究竟所為何事，任務何在？它是文學研究、語文研究，還是區域研究？它的目的是認識與翻譯西方，還是批判與改造自身？百年來不同的思想與時勢又如何影響外文學門的發展？百年後回首前塵，我們又當如何理解外文研究在華文與華人思想史上的知識狀態與文化位置，並且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張力中展望將來？

本書將外文學門的知識實踐座落在百年來學術建制與文化思想的浪潮中回顧，試圖指出：當代意義的外文研究，其源起與19世紀中葉以降殖民主義脈絡下的西學東漸密不可分；它不只標示著近代中國文學觀念的轉變（文學至此有新舊之分、中西之別）以及殖民現代性的到來，更承載了「溝通中外、重建文明」的使命。外文研究的發展代表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企圖以文學思想的譯介來適應與超克殖民現代性的努力。陳長房在題為〈外國文學學門未來整合與發展〉的調查報告中曾指出，外文學門的任務在於「融鑄西方文學理論，並針對中國文學或臺灣文學與文化，進行比較和詮釋性的研究工作，俾使本土文學文化能展現新的生機和意涵」（1999: 428）。何春蕙（1998）亦看到外文研究處在臺灣國際化與本土化的中介位置，不僅對內面對引介、翻譯國外學術成果

---

8 在科技部的學科分類中，英語教學屬於語言學的次門類（下轄英語教學研究、英語能力研究與英語教學應用三個分項），語言學則同時涵蓋從古到今，從西到東的各種語言和方言。

的要求，對外亦承擔與國際交流、對話的責任。面對夾纏在中外之界的外文研究，劉紀蕙（2000a）如此質問：「我們所承接的文化知識體系與我們對話的對象在何處？我們所回應的問題是什麼？面對學術規範與西方觀點，我們要如何以創造性的思考發展本地的學術對話」？單德興亦追問：「在臺灣發展英美文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其歷史、文化脈絡如何？有什麼理論及方法學上的意義？從相對於國際學術主流的邊緣位置出發，我們如何能以有限的資源來有效介入？到底有哪些稱得上是『我們的』立場、觀點、甚至特色與創見」（2002: 204）？這些當代學者對外文研究自身定位的叩問與反思，顯示外文研究，不論過去或現在，始終建立在國家內部思想發展的邊界上，甚或，其歷史即源於文化與語言邊境上的思想碰撞。這些問題也是本書的關切，但其解答方法必須來自於歷史，來自於對「我們」自身歷史形成的深入理解與深刻反省。因此，與其就字義而將外文研究定位為一門研究外國文學與文化的學問，不如將之理解為一個文化、語言與思想的邊境，一種不斷跨界逐譯、比較批判，尋求文明改造的知識實踐。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賦予外文學門之「外」一個動態的理解：它不僅僅是對應本土文化的移動邊境，更是對於中外之別的認識與轉化，是進入與引介現代性的自我翻譯與超越，亦是對現代性本身的重述與改寫。同時，外國文學一詞的重點在於「文學」更甚於「外國」，因為外國不過是相對於本國的參照與借道，廣義的文學創造和文化改造才是其課題與任務。因此，外文研究並不是一個「外國的」學術空間與知識體系。恰恰相反，它的起點乃是文化主體向外探求的思想驅力，是在突破夷夏之防後的文化翻轉與思想改造。<sup>9</sup>雖然國共內戰延宕了（從大陸的角度或可說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展開了）現代中國文化轉型的進程，但新文化運動以降大量引進的西方文藝，對傳統文化造成劇烈衝擊，使得西方思潮與文藝理論逐漸融入現代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生產，乃是不爭的事實。1949年後，渡臺學者亦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努力上延續五四精神，並在

---

9 雖然一般的觀點（包括本書）都是把臺灣外文系和英美的英文系連接比較，但就知識體系形成的邏輯而言，臺灣外文系所當對照的應該是英美的東亞研究。雖然在教學與課程設計上，臺灣的外文系至今仍奉英美為主臬，但在實質的知識生產上，其實與西方的東亞研究有相當的連結。

1960與1970年代的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實踐中開花結果。<sup>10</sup>19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文化研究與族裔文學的開展，展現了橫向移植與縱向繼承的衝突與拉扯，也日益突出今日臺灣外文想像的特色與局限。

本章開頭引用楊牧的文字恰恰體現了這段歷史錯綜複雜，卻又合情合理。這既是中外思潮跨地流轉的過程，即薩依德（Edward Said）所謂的「理論行旅」（traveling theory），也是現代臺灣歷史——經移民、殖民、冷戰而解嚴——不斷發展的理路。因此，若是少了這條橫跨東西、貫穿兩岸的辯證軸線，我們將無從理解外文研究百年來的多元變貌，以及它在現代思想與知識實踐上的深刻意義。是以，本書以「落地轉譯」為題，就是想要強調，外文研究作為文化邊境上的知識實踐，既要與西方接軌，更要經過翻譯、研究與批評，消化西方的知識，使之落地，進入在地的文化脈絡。就像薩依德強調的，想法與理論的移動豐富了文化與智性的生活，不論其採用的形式是「被認知或無意識的影響、創意的借用，或是原封不動的挪用」（1983: 226）。從一端到另一端，理論在行旅中不會毫無變化，而是在不同脈絡的遭逢中，被接納、抗拒、挪用、轉化，乃至獲得新生。因此，作為一種理論行旅的在地版本，外文研究本身即是一個重新表述（re-articulation）的過程，它既是西方思想的行旅，也是本土文化的再造。因為時空變化，在被迫「番易」與主動「翻譯」之間產生的矛盾與掙扎，便構成了外文研究發展的歷史軌跡；這亦是其定位與價值之所依。

「落地轉譯」借用了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霍爾（Stuart Hall）所謂「接合／表述」（articulation）的概念，強調脈絡化研究對象的方式本身就具有接合不同想像與問題意識的可能（Slack, 1996），並且強調地緣政治與文化情境的差異，使得表述必須「落地」，接合需要「轉譯」。也就是說，臺灣的外文研究本身隱含至少兩個層次的接合與表述——首先是在翻譯層次上對西方思想與文化的引述與再次表述（是為「轉譯」），其次是在實踐層次上將西方的思想與文化向自身歷史與文化情境的引介與接合（此即「落地」）。強調接合與表述的過程，一方面是對引介脈絡的重視，另一方面是要強調外文研究乃是中西思想交流的接合之處。就此意義而言，外文研究進出中外、又中又外（或是不中

---

10 關於現代主義文學與鄉土文學和五四的關聯，見Chang, 1993。

不外)的邊境狀態很接近美國文化研究學者葛羅斯堡(Lawrence Grossberg)對於「關鍵接合點」(critical conjuncture)的思考,因為「接合點即是生產特定問題意識(或一整套問題意識)的積累/凝縮(accumulation/condensation)」,而「接合點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聚焦在作為一種複雜表述的集體或總體的社會形構」,「重視改變中的力量形構」,並且「強調一個領域只能生產暫時的穩定性,因為任一領域總是在多元決定的狀態中不斷重組」(2010: 41)。由於接合點本身並不穩定,它會因為社會形構的變化而變動,也因此接合點的意義不在於自身,而在與它與總體社會形構之間的交織與互動。本書認為,外文研究恰恰是這樣的一個關鍵接合點,因為它一方面是順應殖民/現代性下的產物,另一方面又在「落地轉譯」的實踐中提出了超克現代、再造文明的命題——「落地」突出了跨地的事實與在地的應對,「轉譯」則包含了番易與格義的雙重層次。同時,這個命題在不同時點的發展也反映了現代以來,臺灣介於中國、日本與美國之間,總體社會結構的變化;這也就使得其發展並不僅僅是依循著不變的學術傳承,從一而終,而是在不同時空的力場作用下刻劃著或交疊或逸離的不同軌跡。

在臺灣人文學科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落地轉譯」是十分常見的狀況,它也是現代學科建構自身的必由之徑。<sup>11</sup>對以研究西方為職志的外文學者來說,這更是核心的挑戰與任務,因為它牽涉到如何將西方的思想與文化轉介至中國或臺灣的語境裡,更深刻涉及了主體性與存在感的危機與想像。簡單說,如果外文研究不過是引介西方的橋梁(做翻譯),那它該如何表述學術研究要求的原創性,並將自身的知識實踐接合到臺灣社會?如果外文研究的作用不僅止於翻譯,而在於改造本土文化與學術傳統,那麼外文研究的獨特性何在,它與其

---

11 在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落地轉譯」的現象亦很普遍,見劉龍心,2002;孫宏雲,2005;姚純安,2006;劉瑞寬,2008。社會學、人類學與歷史學等領域,尤其重視多元現代性的討論,認為第三世界的現代性是在西方現代文明抵達時交互生產的結果,並在進入地方脈絡後產生了新的創生,見湯志傑,2019。日裔人類學者桑山敬己(2019: 3),在回顧日本本土人類學的發展時,更指出西方知識上的偏見強化了落地轉譯的現象,尤其反映在西方學者進行抽象理論,非西方學者提供本土知識這樣的勞動分工上,致使日本的人類學研究要不備受國際學界冷待,要不以一種東方主義的形式呈現。與外文研究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其他學科一旦引入,開始落地建設之後,即進入本土化的過程,但外文研究一直在本土化與追隨西方之間擺盪。

他學科又如何有所區辨？如果外文研究的工作——尤其在全球化的語境中——旨在介入西方的知識與學術生產，那麼它的主體性與存在感將立基於何處、以什麼語言表現，又是否需要一個民族身分？自外文研究浮現之初，這些問題就困擾著外文學者，直至今日，但這些根本性的問題至今依然推動著外文研究的發展與辯論。美國學者葛雷夫（Gerald Graff）就指出，學院裡的文學研究得要面對的，其實「並不是一套內在邏輯緊密而一致的文化傳統，而是至今未能解決、未受注意，並被視為文學教育正常領域之外的一系列矛盾」（1987: 15）。百年以來，外文研究如何「落地轉譯」，表述自身、接合西方與在地，正是本書所要思考與闡述的重點。<sup>12</sup>

## 從建制史到思想史：方法與材料

雖然有了「落地轉譯」這麼一個文化研究式的方法論，以貫穿百年外文研究的發展，但如何選取研究材料、確立研究對象以及錨定研究方向，仍是莫大的挑戰。這包括了要以學科與機構，還是以學人與思潮為主軸的選擇，以及如何定位外文研究知識生產的挑戰。以學科與機構為焦點，意味著將外文研究的發展定位在體制性的變化當中，關注學科建制（包括機構設置、課程安排、體制要求）的啟動與轉變；這就包括了外國文學這個科目的出現、教育與科研體制對外文教學與研究的想像和要求、具體系所的教學方針與課程安排，乃至教材的決定與使用等問題。然而，如果建制史的紀錄僅僅是史料的堆疊與羅列，將學科的發展與社會分離開來，而缺乏對於歷史脈絡的理解——包括整體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氛圍、促成該學科建制的思潮與人事，及其教學與知識生產所造成的影響等，那麼我們對於該學科發展的認識將只是片面而零碎的，既無

---

12 臺灣英美文學建制研究的先鋒單德興（2009: 26）在翻譯研究中提倡的「雙重脈絡化」一詞，與本書「落地轉譯」的想法，亦有相通之處。他強調的是譯者的角色與職責，「不僅要在原作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中理解原作，也要同時引介其脈絡，以期更周全地認知與引介脈絡中的文本以及文本所具現的脈絡」（2014: 209）。本書強調的則是外文研究的發展，一方面需要對其進行「雙重脈絡化」，同時也要理解西方思想引進後，在中文世界並非原封不動，而是另有來生。對脈絡的重視，也是文化研究方法論的重要環節，見Grossberg, 2010。

法深入理解該學科出現的歷史語境與文化意義，更無法檢視其知識生產之於在地，乃至於西方知識脈絡的對應關係。若以學人和思潮為主軸，則將外文研究預設為一種獨特的思潮，並將其影響歸諸於外文知識與訓練。雖然學科訓練必然對學者的思維造成影響，但是一方面外文學者的知識實踐往往不限於外文一端，而是透過翻譯、創作與研究廣泛地涉入了本土文化領域，另一方面僅視之為某種思潮與時代的印記（例如現代主義和冷戰），亦將忽略學科體制的跨時發展——尤其在當代——如何對學人及其知識生產形成制約或解放。這也就牽涉到如何定義外文研究知識生產的巨大課題：授課講義、教科書、翻譯作品，乃至於創作，能算數嗎？還是只有以外文發表的研究論文才算呢？對那些穿梭於不同學科場域的學者們，如清末的辜鴻銘、民初的徐志摩、周作人、吳宓、朱光潛，或是冷戰時期的夏濟安、夏志清兄弟、顏元叔、侯健和余光中，甚或是解嚴後引進文學理論、族裔文學和文化研究的諸多學者們，如果他們的作用與效果都不僅限於外文學門，我們該如何將他們歸諸外文研究，理解其知識生產的動力和趨向呢？尤其討論學人與思潮是否重要，有多重要這個問題，若少了學科建制發展這條線索，亦容易引發失之個人偏見、掛一漏萬的風險。因此，本書面對的挑戰不僅限於「哪些稱得上是『我們的』」外文研究這樣的問題，更在於如何理解所謂的「立場、觀點，甚至是特色與創見」（單德興，2002: 204）到底從何而來，怎樣發揮，又如何能在歷史變化中展現外文之「外」的獨特性格？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本書採取了「歷史化」的作法，將研究的重點擺在歷史脈絡的重建以及跨越時空的思想聯繫和變化，以追索學科發展的軌跡。本書擷選重要的變化與論辯，以突出形塑外文研究的體制性力量；同時，透過幾個重要的案例——奠基學人、重要機構、關鍵論辯與新興領域——進行分析，以試圖掌握外文研究知識生產與時代、社會與西方學術的互動和辯證。換言之，本書是以在地主義的立場來看待歷史的發展，但同時也藉由思想的流轉與變化，對這個在地主義的歷史進行反省——不僅進行思想史與社會史的探索與重建，更希望透過全球史的視角來思考外文研究，由西方、日本、中國而臺灣的變化軌跡。

在進一步討論前，或許應該先說明本書所涉及的幾個思考場域——建制史、學術史、思想史、社會史與全球史——以及它們各自在本書裡代表的意

義。單德興在〈建制化：初論英美文學研究在臺灣〉這篇重要的文章中，引用美國學者阿帖里（Charles Alteri）的說法討論建制及文學典律的形成：「我們必須認知建制作為組成、結構的一般角色，具有許多的層級，能夠引導、組織權力來促成某些形式的活動」，以強調「建制涉及組織、結構，具有多重交涉的層級，能夠運作權力、甚至樹立權威，促成特定形式的活動（反之則壓抑、排除或不執行其他形式的活動）」（2002: 204）。這表示「建制」指的不只是系所，更是結構、支撐和延展外文系這個教研單位所有的相應組織（包括各類學會、文學院、大學和科技部等）、論述（外文研究的定義與邊界）以及以之為名生產出來的各種知識形式和活動。單德興特別強調「典律與教科書」、「批評與理論」、「學會與期刊」三個方面，並以英語和比較文學為定位，來理解臺灣英美文學研究的建制發展。這樣的思考從既有的體制結構來認定學科存在的樣態，故而暗示了建制史具有某種實證的取向——即存在的即是合理的。然而，實證取向雖然提供理解外文研究的最大邊界，卻無法有效說明其知識生產之意義，以及社會、政治與歷史脈絡（例如文學思潮、冷戰結構以及臺灣獨特的社會組成）對學科發展的衝擊。單德興提到，自1960年代中期臺大外文系採用《諾頓英國文學選集》（*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為教材後，《諾頓文選》便所向披靡，成為全國各大外文系的教材，四十年如一日，<sup>13</sup>但同時外文系的知識生產則從新批評、文學理論而文化研究，翻了數翻；而且對新批評的引介本身亦是「很去脈絡化，去歷史化，總之很新批評式的引介」（2002: 219）；至於學會與期刊則有多頭馬車，同批駕駛的嫌疑，導致「『市場區隔』不明確」，既浪費資源，也有礙學術的多元發展（2002: 223）。換句話說，即使「存在即合理」，但是否必要與正確，就不是建制史所能處理的範疇，而需要學術史的眼光來判斷。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部中國學術史的奠基之作中強調，撰著學術史有四個必要的條件：「第一，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第二，敘某家學說，須將其特點提挈出

---

13 《諾頓文選》引進後，不只英國文學，各大外文系的美國文學以及西洋文學概論也都採用《諾頓文選》作為教材，乃至成為外文系學生的一種象徵。當然，《諾頓文學》本身也經歷了數個版本的變化，而非一成不變。

來，令讀者有很明晰的觀念。第三，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勿以主觀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大概敘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2016: 63）。同時，在整理與評價學術發展的趨向之餘，梁啟超更關心如何在政治的影響中理解學術的發展以及思潮與時代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說，相對於建制史重視體制結構的建立與承續，學術史更在乎學科生發與演變的歷史，並在過程中總結學科的成果、貢獻、誤失和未竟之業。因此，它是對既有學術成績的盤點與反省，以推動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史學家葛兆光對學術史的任務亦有如下的總結：

第一，學術史要說明今天我們從事的「現代學術」是怎樣從「傳統學術」中轉型而來的？也就是說，學術轉型是一個重點。第二，學術史要指出這一學術轉型的背景和動力是什麼？是域外刺激，是學術制度變化，是新資料新方法的推動，還是政治情勢、國家危機或國際環境的作用？第三，學術史還要說清楚一個時代學術研究的趨向、理論和方法，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改變的，什麼是顯著的主流，什麼是被壓抑的潛流？只有這樣，學術史才能夠給今天的學者指明，過去如何變成現在，現在又應當如何變成未來。（葛兆光，2016: iv-v）

易言之，學科的生發與演變固然是學術史的重心，但學科發展無法脫離時代、政治、社會、文化與思想，而是與之交錯和纏結。正因為如此，學術史研究從來就不僅僅是學術而已。研究美國文學建制史的蓀威（David R. Shumway）就指出，「在任何意義上，美國文學都不是一個獨立被研究的課題，其身分〔之建立〕有賴於研究它的機構」（1994: 2）；是故，我們需要一種關於文學的歷史，一種「能夠直面，而不是邊緣化學科知識生產的建制過程與文化脈絡」、可以置疑研究對象的「自然性」（naturalness），並且評估該學科實踐成效的歷史；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試圖理解的是：「學科建制的歷史如何形塑了學科本身」（1994: 5）。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陳平原也強調，現代化之後，文學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訓練的『詞章之學』，轉為知識積累的『文學史』」，因此我們對「文學史」的考察必須從課程設置、著述體例、知識體系與意識形態等四個方面來進行，「四者之間互相糾葛，牽一髮而動全

身」；文學史的發展不僅來自於文學本身，而是處於「思想史、學術史與教育史的夾縫中」，因此我們對文學史的研究也必須「從學科入手，兼及學問體系、學術潮流、學人性格與學科建設」（2011: 2）。

在這個意義上，建制史、學術史與思想史亦有交錯，因為學術並非僅憑一人之智即可成家立派，也不是光靠體制的推動即有所成，而是在人與社會的互動中產生、累積與變化。美國思想史家史華慈（Benjamin Schwarz）便認為思想史的中心課題就是人對環境的反應。他寫道：

在英文裡，「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這個詞是最不幸的，因為它似乎暗示我們只關心最嚴格意義上的智識（intellect），因此似乎也暗示我們只在乎那些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的歷史。就我在此的定義而言，思想史包括了有意識的生活——思想的生活、情緒、想像力以及各種的感性——的總體，而且不僅僅是在概念性的層次。此外，我們關注的絕不是自成領域的思想生活——即所謂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而是人類意識與我們身在其中的歷史處境之間的對應。（Schwartz, 1996: 36-37）

臺灣思想史學者黃俊傑在〈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中詳細分梳了「觀念史」與「思想史」在核心關懷與研究取徑上的差異，以及兩者各自的限制：前者關心思想演變的內在理路，後者更在乎思想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因此，與其擇一為之並為之辯護，他認為更好的研究方法應是「兩者兼顧」（1977: 380），既從內在理路去理解思想的演變，又從社會脈絡中去考掘思想的作用與效果，及其對思想的限制與轉轍。戴景賢更提出學術史、思想史與社會史三者之間「存在不可忽略之關聯性」，因為儘管三者的論域與脈絡各有分野，思想與觀念的發展亦有內在於社會「不可剝奪之『客觀性』」，所以研究的重點應該放在學術、思想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尤其是「互動方式」的形成，以及各種作用產生之界域與類型的判別（2013: 102-103）。

對於外文研究這個來自域外，並一直保持域外特質的學術領域而言，觸動其發展的環境不僅是本地的，更是外國的，這也是外文研究向來被視為中外交流史有機部分的理由。但是，若是我們認真看待外文研究的歷史演變，我們就

會發現中外交流史內在的二元論視野忽略了外文研究「既中且外，非中非外」的事實，因為被交流進來的西方文學與思想，一方面被吸納進本地的知識體系當中，成為學術建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國際學術分工體系當中，它又直接面向國際學術社群，作為本地觀點的「代表」，參與全球人文知識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外文系既是西方人文知識全球霸權的華文節點，又是現代華人知識體系當中的外語介面。<sup>14</sup>如果將西方的英文系視為帝國霸權的全球知識結構，那麼外文系既是帝國霸權的派生物，也是介入與抵抗帝國霸權的核心現場；透過對在地本土知識的翻譯與轉介，它同時也介入了全球人文總體知識的構成，即令它與本土知識保持著緊張關係。因此，與其視之為交流的結果，而孤立對待，我們更應該將外文研究放在中外人文思潮的纏結與同構中來理解，強調其發展本身即是回應、適應與反應的交織過程，看到外文研究不只是引介西方，同時也建構西方和在地人文；它是華文世界的外語介面，也是全球人文的華語組成。換句話說，除了在境內的思想、學術與社會等互動脈絡中考察其生成和演變，我們也應該在全球史的尺度中來考慮外文研究在臺灣發展的意義。<sup>15</sup>

1920年代，外文研究建制化之初，當時的外文學者（如胡適、梅光迪與吳宓）儘管立場不同，<sup>16</sup>但都是現代中國文學的啟動者，他們的書寫與思想亦暗

14 當然這裡預設的是其他的人文學科，相較而言，比較不在國際學術場域中操作，或是說主要仍仰賴在地語言為介面。這只是結構性的比較，而非實證性的觀察。

15 與其將全球史視為一個獨特的領域，本書更願意採用德國史學家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的觀點，將之視為一種視角和研究方法，目的是為了超越中西交流史那種二元對立的觀點，以突出「全球／在地」的交流與纏結對於外文研究的形塑作用。比方說，「在越南讀馬克思」之所以是一個有意思的全球史命題，並不是因為馬克思是全球的，而越南是其全球性的例證，而是因為越南社會變遷所創造出的情勢，使得「在越南讀馬克思」這件事產生了政治上的意義，同時，越南學者對馬克思的翻譯、徵引，乃至於挪用，亦受這些情勢的影響。這就意味「交流」不只是人員、思想或文本的流動，而牽涉到其與在地社會、政治與文化轉變的糾纏。這個糾纏的結果反過來也會影響到我們對全球文本的認識（康拉德，2016：104）。如康拉德所述，「在全球史學者為自己制定的任務中最根本，也最有成效的一項，就是以地方的語法與由來已久的背景環境為框架，深入了解全球結構、制度與思想的『轉化』、挪用與調整，以及這些環境背景如何反過來受到重整——而這正是全球交流的結果」（2016：168）。這正是本書採用的觀點。

16 雖然胡適在中國哲學史與白話文運動的地位牢不可撼，他1917年回國後的第一份工作卻是北

含對帝國戰爭與西方人文精神衰微的回應。日本殖民時期，臺北帝國大學裡的外文學者（如島田謹二、矢野峰人）則在比較文學的視野中探索臺灣的文藝風貌，以思考日本殖民主義的社會與文化基礎。冷戰時期，外文學者的影響力不僅一定程度超越慎守訓誥傳統的中文系學者，他們所引進的西方知識更是強而有力的理論工具，成為中文學術現代化與規範化的準繩；同時，他們也介入了當時的社會與文化動態——包括現代主義思潮、鄉土文學論戰、文化復興運動——乃至在解嚴後借「理論」之名形塑了當前臺灣的自我意識與主導話語。尤其1980年代後西方理論的引進，更反映了後冷戰時期臺灣外文學界如何跟進西方六八學運後的思想大潮——從女性主義、性別研究，到後現代、後殖民等左翼批判理論以及族裔文學與文化研究，不一而足——也展現了解嚴後外文學者轉譯西方理論，使之落地本土的努力與情懷。在這個意義上，外文研究的發展與轉化不僅具有思想史的意義，它與臺灣社會以及西方人文的互動與辯證，亦是中外交流史、社會史、文化史與思想史的重要課題。因此，本書在取材上，一方面以建制史的資料為基礎，從學科建制、課程設置、知識產出等方面，爬梳外文研究這個學科的誕生、發展與變化；另一方面，也擷選重要的學者、論辯與思潮作為研究案例，深入學者們的論著，描繪其思想動態，以分析學術、思想與社會的互動，視其發展與變化為跨地論辯與全球交流的持續過程。儘管就選材而言，本書或許難脫任意和武斷的批評，但其目的不在於將所選所述絕對化或神聖化，而是希望在建制史與學術史的介面上，重新挖掘與詮釋被遺忘或排除，乃至已經被經典化的論辯、人物和事件，重新探索它們與西方文學、殖民經驗以及臺灣歷史、社會與思想的關聯，以期在全球史的尺度上，標誌外文研究的時代意義，並在前輩學人的肩膀上，瞻望未來。

---

大英文系的教授兼系主任；梅光迪和吳宓都反對胡適推動白話文運動，但他倆哈佛畢業後，也都在東南大學外文系任教；吳宓後來更轉至清華外文系，成為民初外文研究最重要的舵手，即令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擔任《學衡》的編輯。梅光迪離開中國後，則回到哈佛教授中國文學。關於這三人與外文研究的關係，見第一章。

## 「文學」與殖民現代性：理論

現代性不是物而是關係，進入關係即是現代的最終標誌。

——Arif Dirlik (2003 : 279)

現代文學是日本在蛻變為帝國主義的時候，從失敗的自由民權派人士那裡產生出來的，因此是排除了政治性現實的內面的文學。另外，近些年我發覺，這一時期同樣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

——柄谷行人 (2016: 7)

無庸諱言，外文研究的誕生與西方殖民的歷史脫不了關係，而且正是在西方炮艦外交的威脅下，外文研究才在西學東漸的風潮中展露其面貌和意義。和徐中約、丁韞良合作翻譯萬國公法相同，外文研究的出現也標誌著國際現代體系的到來與確立，中國與臺灣無法置身其外。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後，臺灣外文研究與本土文學的發展，即令為時不長，也與日本殖民脈絡密切相關。外文研究對自身主體性的不確定感——即西方究竟是外文研究的對象，或是方法？外文研究與本國文化又有什麼關係？——亦與此相關。從思想史的角度觀之，外文研究和現代中國文學或是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一樣，都是西學東漸下的產物，其正當性來自於西方（或自認屬於西方的日本）作為現代性模板這一事實以及民族主義的需要，因此它也是現代意義上（即經過西方文學轉化過）的「文學」的必要介面。不同的是，現代文學仰賴創作而生，而外文研究則以引介和批評為尚；作為貫通西方思想的門道，它必須從歷史入手理解文學，又必須借道文學認識西方。因此，外文研究其實處於現代文學的內面，是支撐與滋養現代文學的養分，即令在知識結構上，它被放在一個外部的位置上。因此，外文研究更像是一個現代文學的裝置，一方面明確了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與古典文論不同），另一方面又為其錨定邊界（以白話中文或現代日語為主）；更重要的是，以對西方的認識為基礎，它從根本上更新與確立了文學的意義。

不少學者討論過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與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並不相同。陳

平原指出，在中國傳統裡，文學指的就是廣義的「文化教育」與「人文修養」（2009: 109-110），那是對儒家道統的繼承與內化，而非西方為了中產階級閒暇愉悅而生產的創造性虛構。<sup>17</sup>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也發現，中國傳統文人對文學的理解，往往與文風和經典的意義相關，因而與西方視之為「美文」（*belles lettres*）和創作，強調其「自主性，不受教化目的與政府要求所強制」（1987: 96）的認識大異其趣。袁進認為，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由西方傳教士所引進，並經由梁啟超、魯迅、胡適等一代文人，透過白話文運動的推進而逐漸確立下來，從美學與人生的向度來肯定「文學」的獨特性與價值；自此，將一切文字著述歸諸文學的傳統觀念解體，文學改為「專屬於表現人生情感的虛構想像作品，從而也成為獨立的人文學科」（2010: 10）。這一發展與近代個體的解放及現代學科的細緻化相關；文學，從作為人之修養的道學，至此轉變為描摹與細究人——尤其是其內心世界——的技術和知識，「這樣，文學也就由『道』轉向了『人』」（袁進，2010: 10）。難怪，五四以降總是文學與人生並論，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尤為代表。<sup>18</sup>

同時，這個大寫的「文學」——和「國家」、「文化」、「傳統」一樣——也是由基督教傳教士的翻譯與和式漢文雙程衍異而來的概念。<sup>19</sup>劉禾便指出，這些借詞「不只是對都會歐洲理論的翻譯，更重要的，它們是被中介的表達形式，承載著〔西化知識分子〕整體化的西方經驗」（1999: 184）。因此，現代意義的「文學」在20世紀初透過白話文運動被建構的時候，就已經承擔了在世界文學共和國中再現民族的任務；外國文學或世界文學不是現代中國文學的對立面，而是其存在的條件。大量譯介的外國文學將中國文學從自身的邊陲性與優越性中，推入一個由「殖民／現代世界體系」（colonial/modern

17 不過，陳平原這一說法，並不十分準確，因為西方現代文學（以浪漫主義為典範）的出現，除了工業革命的影響與消費社會的興起外，亦有瞻望古典的成分。關於西方現代文學的源起，見Watt, 1987; Coates and White, 1970: 52-79；對此起源之批評，見Azim, 1993。

18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寫道：「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其中又可以分作兩項：（一）是正面的，寫這理想生活，或人間上達的可能性；（二）是側面的，寫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1918: 578-579）。

19 關於英文literature一詞如何譯入中文和日文的過程，可參考劉禾，1999；鈴木貞美，2011: 101-113；蔡祝青，2012。

world system) 所定義的全球關係當中。如劉禾所述：「世界文學這個詞的翻譯，就預設了如何在現代國際社群中解釋與正當化中國的巨大任務〔……〕五四作家轉向歐洲文學時，大多帶著學習如何產造一個值得被世界文學所接受，並被西方所重視的民族經典的意向」（1999: 188）。鈴木貞美則強調，日本文學的開端來自於對日本文學衰落的感嘆（2011: 114），而這個感嘆恰恰來自於對西方文學定義的接受；自此日本文學走入了現代，日本文學史也開始萌芽（2011: 119-123）。這約莫也是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視第三世界文學為國族寓言的意思，只不過詹明信更強調的是作為形式（或是日本批評家柄谷行人所說的「裝置」），而非作為內容的國族寓言，因為唯有取得國族的身分，文學始能進入世界的大門；唯有在西方的文學框架中，日本文學或中國文學才獲得了現代國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的資格。<sup>20</sup>換句話說，當現代意義的「文學」抵達中國的時候，它就成為一種「認識性裝置」（柄谷，2003: 12）：在西方經典與炮艦中現身的現代文學自此置換了此前存在於本土的文學觀念。<sup>21</sup>法國哲學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也抱持類似的理解。他指出，1800年斯戴爾夫人（Germaine de Staël）《文學論》（*De la littérature*）的出版，標誌了現代文學觀念的轉變，文學成為「一種新的書寫體制，以及另一種連繫政治的方法，其原則是：書寫不再將某人的意志強加於另一人之上，如同演說家、傳教士或將軍那樣。它展示與解讀事物狀態的徵候。它揭示歷史的符號，像地質學家那樣深入演說家與政治家底下的縫隙與層次——那些構成了其基礎的縫隙與層次」（2010: 161-162）。「文學」自此不再只是傳統與經典、或只是想像性的創造，而是一種全新的、現代的感知配置與認識裝置。

柄谷行人將現代文學視為認識性裝置的考察尤其值得借鏡。在《日本現代

20 1986年詹明信在《社會文本》（*Social Text*）上發表了〈多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這篇文章，以解釋第三世界文學與資本主義的共謀關係。然而他將第三世界文學視為「國族寓言」這一觀點卻導致相當多的批評。相關批評的整理，見Qin Wang, 2013。

21 事實上，英國文學批評家伊戈頓也提到，在19世紀以前，英國人對現代意義的文學觀一樣感到陌生，因為在那之前，文學並不同於「創意」和「想像」，而是「有價值的書寫：哲學、歷史、文論、信件與詩」（Eagleton, 1983: 15）。他坦言：「就我們所繼承的字的意義而言，文學就是一個意識形態」（1983: 19）。柄谷行人也注意到，文學的「顛倒」不只存在於東方，更要到西方去溯源（2003: 13）。

文學的起源》裡，他將現代文學的出現解釋為一種現代性的徵候，而這個徵候仰賴兩個發現來運作，一是「風景」，二是「內面」；前者與再現對象的選擇框架和視角相關，後者則與再現的制度性和物質性連動。他首先從夏目漱石的《文學論》當中提出了「文學為何物」的問題，強調漱石當時在英國所學習與接收到的「文學」並非是一個普遍的概念，而是與日本漢文學相對立的一個觀念，可是這個以英國文學為基礎的「文學」後來卻被確立為一種普遍的概念，從而掩蓋了自身的歷史性。是以，柄谷行人將漱石學習英國文學後所產生的「被英國文學所欺而生不安之感念」，理解為日本進入與適應現代過程中的掙扎時刻，以突出現代文學概念本身的歷史基礎與意識形態特色。柄谷強調，漱石所說的「漢文學」，恰似被稱之為「山水畫」的日本繪畫，因為「所謂山水畫乃是由風景畫的存在而得以存在的」（2003: 8）。他引用宇佐美圭司對山水畫的討論指出：「山水畫這一名稱並不存在於這裡展示的繪畫所實際描述的時代裡，在那個時代人們稱之為四季繪或月并」，它其實「是由指導過明治日本現代化的芬尼羅莎（Ernest Fenollosa）命名，並放在繪畫表現的範疇中給予一席之地的。因此可以說山水畫這一命名本身，乃是由於西洋現代意識與日本文化之間的乖離而出現的」（2003: 9）。<sup>22</sup>換句話說，若沒有西方風景畫這個認識性裝置的介入，現代意義上——即作為風景，而非民俗——的日本山水畫是不存在的。是故，

「風景之發現」並不是存在於由過去至現在的直線性歷史之中，而是存在於某種扭曲的、顛倒了的時間性中。已經習慣了風景者看不到這種扭曲。漱石的懷疑正是由此開始，「有被英國文學所欺而生不安之感念」既〔即〕是生存於此種「風景」裡的不安。〔……〕正如國學家想像漢文學以前的日本文學時，是因為有了漢文學的意識才要這樣做的一樣，談論「風景」以前的風景時，乃是在通過已有的「風景」概念來觀察的。比

---

22 芬尼羅莎（1853-1908）是專研日本藝術的美國學者和收藏家。他曾在東京帝國大學（今日東京大學的前身）教授哲學與政治經濟學；在那裡，他結識了或許是生涯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岡倉天心。離開東京帝大後，他協助創立了東京美術學校以及東京博物館，並與日本畫家狩野芳崖和橋本雅邦合作，建立了日本的「風景畫」。返美後，他在波士頓美術館工作，替該館的東方部門建立相當豐富的日本藝術收藏。

如，我們應該意識到：在質問山水畫為何物時，這個質問已是基於顛倒的關係之上了。（柄谷，2003: 10）

因此，所謂「風景」其實是一種內化了的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視角，透過它，日本學會從西方的眼中觀看日本的「風景」，並以之為代表「日本」的風景。若是遍尋不到，那就發明之——現代文學於焉興之。是以，風景的發現也是一種發明和創造，其核心現場就是「言文一致」運動。

柄谷強調，言文一致運動的本質並不是廢除漢字這樣看似革命性的行動，而是「『文』（漢字）的優越地位遭到了根本的顛覆，而且是在聲音文字優越的思想指導下被顛覆的」（2003: 41）。他從改良戲劇的例子中去說明言文一致的意義，並引用伊藤整對當時新派演員和劇作家市川團十郎的描述：市川「當時被嘲諷為不入流的演員，因為他的演技太新潮了。他拋棄古典誇張的科白，活用日常會話的形式，比起大幅度轉動身體之豔麗演技，他更苦心摸索把神情印象傳達給觀眾的表現手法」（2003: 45）；自此，歌舞伎演員不再以濃妝來勾勒角色的臉譜，而要拿掉臉譜的假面以「素顏」示人。換言之，這是要要求戲劇創作從經典化，以至於僵化的文字規範轉向生活化的語言實踐，以對人生進行一種寫實的模仿。這與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主張白話文創作理應服膺八項條件——「須言之有物」、「不摹倣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以求達意表情的想法如出一轍。<sup>23</sup>同時，柄谷強調，寫實性的素顏所企圖展現的正是他稱之為「內面」的東西，即隱藏在素顏背後，我們

23 關於言文一致有兩點值得強調：一是西方文字聲音主義的影響，二是戲劇改良的借鏡。在帝國主義的背景下，言文一致主張仿效西方，欲將象形文字改為拼音文字，以利教育推廣、改善民智，是以後來有了更為基進的中文拉丁化和世界語運動。同時，言文一致的想像促使學者重視和重新檢視俗民文學與白話表達，而戲劇就是最重要的現場。因此，市川的「新潮」是相對於日本傳統戲劇而言，其源頭正是西方戲劇。同樣的，中國的話劇亦是相對於傳統戲劇而發展出來的西化現代戲劇。從傳統戲曲的探究和整理，到新式話劇的興起和發展，恰恰是在言文一致運動思想指導下的結果。關於胡適對白話的看法，及其與戲劇的關係，見林毓凱，2018。倪偉則將中國的言文一致運動推前至清末的切音字、廢除漢字論、白話報和演說文等改革主張，批評這些主張未能切實建構起白話使用者的主體性，而要到五四的新文學時代，白話文才真正承擔起了它的歷史使命（2019: 77-99）。

或許可以稱之為「意義」的東西。他寫道：

「內面」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存在著的。它不過是在符號論式的裝置之顛倒中最終出現的。可是，「內面」一旦出現，素顏恐怕就要成為「表現」這個「內面」的東西了。演技的意義在這裡被反轉過來，市川團十郎當時被稱為不入流的演員具有象徵意義。這與二葉亭四迷「寫不好文章」而開始了「言文一致」體的寫作有相似之處。以前的觀眾在演員的「人形」式的身體姿態中，在「假面」化的臉面上，換句話說在作為形象的臉面裡感受到了活生生的意義。可是，現在則必須於無所不在的身影姿態和面孔的「背後」尋找其意義（所指）。（柄谷，2003: 47）

簡言之，言文一致的預設其實就是寫實主義，而寫實的極致就是人的「內面」，即人的心理或是話語底層的所指。對內面的追求，使人成為了現代意義下的「風景」，而言文一致中的「文」則是表現這道風景的物質性媒介。同時，被預設為透明的、純媒介性的「文」既表達了人，也以人的主體性為依歸，於是具有內面、主體的「人」就成為一種制度性的存在。這樣的「人」既是「文」（白話書寫）的起點，也是終點，並且成為一種表達或話語的建構。所以，柄谷寫道：「『現代的自我』只有通過某種物質性或可以稱為『制度』性的東西其存在才是可能的。就是說，與制度相對抗的『內面』之制度性乃是問題的所在」（2003: 52）。風景與內面的發現與制度化，因此，恰恰是現代性中的「文學的政治」，而且這個政治是在對殖民／現代體系的接受與傳統的顛倒上建立起來的。

柄谷的討論一方面提示了「現代文學」與「殖民／現代性」的關聯，即後殖民思想家米諾羅（Walter D. Mignolo）所強調，殖民性是現代性的「陰暗面」（dark side），是「其構成，而非其派生物」（2001: 22, 26）的觀點。對出身於阿根廷的米諾羅來說，拉丁美洲是在西歐殖民體系當中進入現代；拉美現代性或許有自身的內在動力，也與其他地方的形構不同，但它內在於西方權力的殖民性當中這點是無庸置疑的。後殖民評論家德里克（Arif Dirlik）也認為，今日學院裡流行的另類現代性或多元現代性之類的講法，若以史實觀之，事實上唯有在全球化資本主義所形塑的共同現代性這個預設上才能成立的（2003:

275)。在這個觀點下，全球化是將世界各個角落帶入複雜殖民關係中的歷史過程。這也是為什麼米諾羅及德里克等後殖民批評家主張從「殖民／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來理解（全球）現代性的意義。二方面，「現代文學」本身即是民族國家知識生產的機制，兩者不可分離。作為一種認識性裝置，它發明了「文學」，也打造了「國族」，並且成為殖民／現代世界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環。我們或許無力扭轉這個顛倒，因為我們已經深深嵌入這個殖民／現代／國族想像的風景當中。誠如米諾羅所言，我們的挑戰不是要「在現有的學科結構當中找到新的模式」，而是要批判地檢視「知識生產的結構以及學術的文化」（1999: 1）。更精確地說，在建構新的知識範式前，我們首先必須認識與反思既存知識範式本身的歷史性，以及隱身其中的殖民性和地緣政治。

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外文研究其實正是在現代性與殖民性之間、在世界文學與國族文學之間，乃至在本土與離散之間不斷摸索自身發展的軌跡和定位。一方面，它與作為國族文學的現代中國文學和臺灣文學共生，另一方面又在接引現代的過程中，處於西方文學與歷史的陰影之中。作為學習西方的跳板，它不僅在實務上面臨著「以史入文」和「以文為史」的矛盾，又往往在再現西方的同時落入西方主義與自我東方化的陷阱；這點尤其反映在外文學人在選擇學術生涯和學科領域時所面對的徬徨；<sup>24</sup>也因此，從柄谷的角度來說，世界文學或比較文學想像其實也是一種資本主義的交換體系：學習外文、認識西方，正是為了進入這個交換關係，企圖轉換和改造。但究竟誰改造了誰，又交換了什麼，仍是未定之數。<sup>25</sup>在這個意義上，殖民／現代性想像當中的權力關係並不是單向的宰制，而是以現代之名進行互動、交流與交換的鬥爭。尤其重要的是，這個鬥爭不僅在東方的殖民現場中發生，它的啟動亦源於西方自身的現代性改造。在西方從帝國轉向民族國家的後殖民變造中，在從古典往現代的思想過渡當中，現代文學浮現為一關鍵的知識場域，既連接傳統與現代，也區

---

24 這點在第一章和第三章會有較深入的討論。

25 柄谷行人的《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雖然是以學科的思考為基盤，但更直指支撐現代文學的民族主義，以及與之共謀的資本與帝國。在該書的〈中文版作者序〉裡，柄谷就指出，「資產階級革命之後的國家乃是由資本制市場經濟、國家和民族以三位一體的形式綜合而成的」，是故我們對於民族主義的批評必須「走出資本制＝民族＝國家三位一體之圓環」（2003: 5）。

隔自我與他者。因此，在追索外文研究在臺灣的發展軌跡之前，我們應該對西方現代文學的建制歷史進行初步的考察與探索。

## 「文學」與殖民現代性：歷史

文學建制，內蘊於更寬廣的意識形態結構裡，折射、凝結或精煉社會與意識形態的傾向，延展歷史的過程。

——Kumkum Sangari (1994: 115)

1899年夏目漱石前往倫敦留學，當時作為學科的「英國文學」大概只有不到百年的發展，而作為建制的「英國語言和文學系」在牛津大學甫才成立5年，那時的牛津英文系連自己的圖書館都沒有，只有一位講座教授，在1897-1906草創的前10年間，每年修業學生不超過30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sup>26</sup>而漱石就讀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最初稱為倫敦大學，成立於1826年，和晚它3年才成立的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才是最早開始教授英國文學的「高等學府」。<sup>27</sup>從今天回望，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過去，但這是歷史的事實。

當然，我們不能以現在的學術標準去理解當時的「高等學府」。根據帕默（D. J. Palmer）的記述，當時的學院頂多是不負擔教學任務的考試機關，其存在只是為了提供證明、證書和學位；在1836年以前，這些學院甚至不提供學

26 當時的講座教授（Professorship of English, the Anglo Saxon Chair）是兩度擔任此職（1849-1854; 1876-1903）的歷史語言學家爾利（John Earle）。他的繼任者是英國文學史上大名鼎鼎的萊利爵士。

27 1836年，這兩所學院又合併為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不同於牛津和劍橋，倫敦大學是英國第一所不以宗教資格作為入學要求的世俗性大學。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辦的雜誌《一年到頭》（*All the Year Round*）在1858年稱倫敦大學為「人民的大學」。它也是英國第一所招收女性就讀的大學。1898年開始的教育改革以及1900年新的聯邦制度通過後，倫敦市內的諸多學院陸續加入倫敦大學系統，至今形成龐大的規模。不過，儘管倫敦大學下轄不同學院，在招生、財務，乃至學位頒與上，各個學院仍是獨立分治的。

位；就讀的學生多在16-18歲之間，畢業後要不從商，要不轉向牛津和劍橋深造。新興學院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當時正努力向外拓殖的英國政府發現，強調修辭、邏輯與文法的古典教育雖然重要，卻不實用；面對廣大中產階級的興起以及工人階級的出現，高等教育不只需要與宗教脫鉤，更必須配合社會的需要，提供「有用的知識」。的確，拉丁文與希臘文雖然典雅，卻不是傳遞有用知識、培養人才最有效的工具，因為語言只是工具，重要的是內容。是故，不僅16世紀宗教改革後，英國各地陸續出現反對教會把持教育、由私人經營的「異議書院」（dissenting academies），以英文為授課語言和內容，以傳遞實用知識；18世紀末的「成人學校」運動以及因而興起的工人學校，也成為英國語言與文學研究發展的溫床；女子教育的出現，尤其以英國文學為重要的媒介，這使得女性成為修習英國文學的主力。<sup>28</sup>然而，19世紀以前，從文法學校到大學的正規教育，都以拉丁文和希臘文為主；即令英文與英國文學，因其實用價值逐漸獲得重視，但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它一直是以古典學（Classics）為模板，亦步亦趨，以確保自身的學科價值，又與之區辨，試圖別開蹊徑。同時，從德國移植而來、強勢發展的語文學（Philology）<sup>29</sup>強化了英語研究的科學性。它提供了一套方法論，將語言的研究與民族歷史結合，從而確立英文研究（English Studies）的學術任務。建制史學者廓爾特（Franklin E. Court）就指出，

到了1850年代，英國文學研究開始代表「文化」，這正是西方文明的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積累的，但必然的種族記憶遺產，開始被建構的時候。語文學開始尋找這種原創的文化形式和原始的意識結構，而文學即是其反映；同時，教授與學生也被期待要透過研究原始的語言建構來找到這樣的意識結構。（1992: 78）

---

28 帕默就指出，牛津英國語文學系成立的前10年（1897-1906），修習的學生大多為女性（Palmer, 1965: 116）；在女子教育興起的19世紀中葉，英國文學也被認為是較適合女性修習的學科（Palmer, 1965: 38）。

29 「Philology」是19世紀興起的一門學問，主要是以比較的方法研究語言的歷史變化，例如母音的跨時演變或是德文和英文發音與字構的區別和變化，它與後來的語言學（linguistics）一門相繼，故譯為「語文學」，略作區辨。關於語文學對英文研究的影響，見Gupta, 2015。

簡單地說，語文學作為一種學術範式，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與文學研究格格不入，但最終仍在語言與民族、文化乃至於西方文明的接合上，為現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正當性基礎。英文教育（English education）不再只是為了識字，而是為了保存文化。葛雷夫與華納（Michael Warner）亦強調，雖然語文學研究的重點是語言——如母音的變化——但它往往仰賴文學作品的文字作為例證（1989: 4-5）。這意味著，在學術現代化和專業化的過程中，文學一開始是作為語言研究的對象而存在的，但它最終卻在民族文化的想像中，和語言研究分途，自成領域，儘管當今不少學院裡，語言學家和文學研究者仍同處一系。<sup>30</sup>

但是，真正賦予英文研究現代意義的是19世紀的帝國民族主義，透過浪漫主義重新發明的文學想像。帕默指出，皇后學院英國文學教授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在其講座中指出的文學乃「民族自傳」這樣觀點影響深遠，因為此一認識不僅意味英國文學，像古典文學一樣，可以肩負教化百姓的任務，它更可以憑著與過去的連繫，成為今日的借鑑；同時，浪漫主義的文學觀將文學重新塑造為一種「感覺的文化」（culture of feelings），以克服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衝擊：文化生活的貧瘠、人民與傳統的疏離等（Palmer, 1965: 39）。1922年，在牛津大學莫頓學院英國文學教授的就職演說上，葛登（George Gordon）指出，在戰後頹唐的狀況下，英國文學必須負擔起三重的任務：「繼續提供愉悅，指導智性，但最重要是拯救我們的靈魂與療癒國家」（引自Eagleton, 1983: 21）。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伊戈頓（Terry Eagleton）也認為，當代文學觀念興起於浪漫時期；它不僅具有「控制與整合勞動階級」的政治作用（1983: 21），亦隨著帝國戰爭與民族主義抵達高峰，成為主導性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它提供一個向「人類處境提出根本質問的場域」（1983: 27）。作為維繫傳統與現代、國族與人民之間的關鍵紐帶，文學不只傳遞過去的經驗，自身更成為經驗的場域，揉合歷史性、現代性與民族獨特性於一身。因此，文學研究自然會產生一個歷史化的走向，希望在文學中找到現代生活與國族歷史的連結。據此觀點，澳洲學者里德（Ian Reid）就認為，浪漫派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對於英國文學研究建制的影響力要比阿諾德（Matthew Arnold）、柯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莎

---

30 關於這個矛盾，第一章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士比亞更大，因為他強調的自然、想像、精神、自我和創造力等觀念，更能夠表述英國文學的民族特性，賦予文學實用的價值。里德寫道：

許多地方〔英文系的〕學術實踐依然保有以下的特色：文學（「想像」）的書寫是英文研究的主要內容，而特定文類（尤其是詩）具有特殊的地位；文化傳統，從民族與歷史觀之，是教學的重點；作家個人的特質也是重要的旨趣，因為文本是自我獨特的表述；因此，讀者個人對文本的回應是合適的教學重點，因為它被認為體現了個人知識、經驗、感覺、想法、心靈成長以及倫理監控內在技巧的成果。就許多例子來看，這些預設都是由獨特的華茲華斯性格所定調的。（2004: 214）

毫無疑問的，里德所列舉的諸般特色正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預設。英國文學的發展不只服膺大英帝國主義的需求，更是對其正當性與民族光榮的表述。再一次伊戈頓對此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文學是一種當代社會力量的意識形態，它指向了中產階級的興起，以及帝國擴張之際的維多利亞英國，如何重新定位自身的使命。他語帶嘲諷地寫道：

文學會在大眾的心裡操演多元思想與感受的習慣，說服他們去認識到，除了自身的觀點外，還有其他——即主人的——觀點存在。它會把布爾喬亞文明的道德寶藏傳給他們，令他們對中產階級的成就油然而生起尊敬之心；而且，因為閱讀基本上是孤獨與沉思的活動，它會抑制他們心中想要進行集體政治行動的衝動（Eagleton, 1983: 22）。

雖然伊戈頓在文中並沒有申論殖民的脈絡，他還是指出了文學鞏固了英國的民族認同，使得大英帝國的海外侍從得以抱持文化優越的心態面對廣大的被殖民者（Eagleton, 1983: 25）。印度學者的相關研究也記錄了英國語言與文學教育如何服務大英帝國。桑加莉（Kumkum Sangari）就寫道，英國統治者想將英國文學「從模倣古典學的位置提升，使自身成為一種古典，變成現代印度人尊崇古典的符號，就好像拉丁文和希臘文在16世紀的地位一樣」（1994: 76）。薩依德的學生，薇絲瓦納珊（Gauri Viswanathan）更指出，「在英國文

學於母國完成學科建制之前，它就是殖民地印度教程中的一個科目」（1989: 3）；東印度公司1813年的憲章法案（Charter Act）標示了英國文學教育在印度的起點（1989: 23），其目的，如麥考萊男爵（Thomas B. Macaulay）於1835年〈關於教育的會議紀錄〉（“Minute on Education”）上所寫的，就是「要去形成一個階級，可以在我們和我們治理的百萬人民之間擔任翻譯，去造化一群在血液和膚色上是印度人，但是在品味、意見、道德和智性上是英國人的人。我們可以任這一群人去改善當地的語言，以借自西方的科學名詞去豐富這些語言，並讓它們逐漸成為向廣大人民傳遞知識的合適工作」（引自Chandra, 2012: 9）。換言之，是因為殖民治理所需，才使得英國的語言與文學成為帝國的語言和文學，間接促成其在母國的發展。<sup>31</sup>里德亦不諱言，華茲華斯是「帝國的詩人」，在詩作當中召喚愛國的熱情，以及讀者和土地的連結，即令在熱帶殖民地，英國的水仙花往往無處可尋（2004: 134-136）。<sup>32</sup>這或許是令漱石感到不安的另一個理由。

誠然，是帝國與市場的力量推動了英文研究的全球發展。1855年，在麥考萊男爵和喬伊特（Benjamin Jowett）等教育家的推動下，東印度公司民政服務部要求應徵者必須通過考試，其中英文被賦予相當的權重，以測試應徵者對英國歷史與組成的了解，並要求他們展現對英國詩人、智慧與哲學家的認識（Palmer, 1965: 46）。這項政策對民間造成相當影響，不只反映在公立學校的教學方針上，也在1858年牛津和劍橋的地方招生考試以及1859年倫敦大學首度舉行的英文學士測驗中確立。儘管這個時候的英國文學教育仍傾向事實的記誦，少有分析，<sup>33</sup>但這些舉措逐步為英國文學創造了市場：書店開始出版相關

31 英國文學與帝國關係最密切、感受最深刻的還是印度，因為在印度，英語不只是殖民的，也是現代的語言；它是帝國的、異國的，也是自己的語言。英國文學不僅象徵殖民權力與帝國文化，亦是重建印度本土文化的範本。關於英國文學與語言教育在印度的起源與發展，見Visawanathan, 1989; Joshi, 1994; Dash, 2009; Mukherjee, 2009; Chandra, 2012; Gupta, 2015。

32 出生於英屬馬來亞的亞裔美國詩人林玉玲（Shirley Lim）曾提到，閱讀華茲華斯的詩作讓她在熱帶的麻六甲遍尋水仙（daffodil）而不著，卻忽視了就在身邊、屬於熱帶的朱槿（hibiscus），見Pennycook, 2017: 276。

33 比方說，當年的試題大多類似下列問題：簡述伊莉莎白時代戲劇Gorboduc的情節；英國第一部喜劇作品Gammer Gurton's Needle是誰寫的，創作於何時？請簡述其情節；提供至1603年止莎翁生平的主要事實等（Palmer, 1965: 47）。就筆者的經驗而言，這類考題對臺灣許多外文

書籍作為應試者的教材，學者也開始考證的工作，以提供更翔實而完整的讀本。哈蒙德（Mary Hammond）的研究便發現，1880-1914年間，英國的圖書館運動、火車站的書肆（例如至今仍然可見的W. H. Smith書店）、大學出版社以及婦女閱讀人口的增加，都為英國文學的普及創造了龐大的能量。伊戈頓更將期刊、咖啡館、社會與藝術評論、牧師佈道、古典文學的翻譯以及行為和道德指南等，都視為文學意識形態建制的一部分（Eagleton, 1983: 15）。同時，課程改革亦有所推進，尤其是從工人學院發展出來，針對校外生的延伸和函授課程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這都說明了英文研究得以在1870年代遍地開花，蔚為風潮的條件。到了1880年代，英國語言和文學不再只是邊緣性、功能性的知識，而開始具備學科的架勢。這使得牛津、劍橋等傳統名校也不得不調整自身的學科結構——例如，劍橋在1878年設置的中古與現代文學學士學位（Tripos）中就納入英國文學，而牛津則在1894年成立英文學院（School of English）——來面對與接納這門新興學科，予以更為豐厚和堅實的學術基礎。

但是英文研究真正的發展要到20世紀以後：在牛津，萊利爵士（Walter Raleigh）於1903年接任英國文學講座教授後，大舉興革，一方面將文學研究與語文研究分途，使得修習的學生可以更為專精，另一方面和其他學者合作，強調語言學與歷史學對於英國語言與文學的研究有不可分割的重要性，從而確認「以史入文」和「以文為史」的研究路線。同時，透過向學生收取學費，成立基金，他不僅向牛津爭取到更多的財務挹注，擴充師資，也有餘裕成立圖書館，充實設備，為英國語言和文學成為現代學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自此，教學目的不再只是為了滿足學生學習的需要，更要專注於學者的養成與學科的發展，在經歷了1920-1970年代葛雷夫所謂「學者」（scholar）與「批評家」（critic）兩種範式的針鋒相對之後，「學者」勝出，學院裡的文學批評也進入「專業化」的時代。<sup>34</sup>劍橋的發展雖然晚於牛津，卻找到不同的側重點。帕

---

系的學生並不陌生。

34 在美國，葛雷夫就認為，文學研究的進展，在1920-1970年代，核心的動力就是圍繞著專業化的辯論：不論是古典學與現代語文的鬥爭、專門研究與一般學養的矛盾、學者與批評家的區別，還是新人文主義與新批評、學院批評與文化批評等種種的區辨，乃至於批評與理論的分家，說到底都是專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Graff, 1987: 14）。諾斯（Joseph North）更強調，從今天回看，葛雷夫討論的1920-1970年代學者與批評家之爭，最終是學者勝出了，結果卻導

默認為，劍橋在1917年後確立了「人生、文學與思想」這個方向，不僅在教學和研究上讓文學與語言分途，更有想要以英國文學取代古典學，成為一般人文訓練基礎的企圖。1920年代出現的劍橋學派，以瑞恰慈（I. A. Richards）高舉的「實用批評」以及他的學生，曾經任教西南聯大燕卜蘇（William Empson）為代表，更凸顯了劍橋學派在研究取向上更接近哲學與社會的事實，較之牛津強調歷史和語言，有了不同的側重（Palmer, 1965: 153）。事實上，恰恰是劍橋學派和瑞恰慈的「實用批評」以及之後橫跨大西洋發展起來的「新批評」（New Criticism）對中國和臺灣的外文研究在二戰前後的發展起到了最為深遠的影響。<sup>35</sup>

在美國，英文系的發展也得從現代語言與古典研究分家開始說起。在哈佛，1868年，英文才首度被認可為一個學科領域（Grandgent, 1930: 67），其發展與現代語言（主要是法文、德文與西班牙文）和古典語言（即希臘文與拉丁文）的分家同步。1877年，哈佛的課程目錄上明列英文、德文、法文、義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為入學考試科目，在這之前入學考試只考希臘文和拉丁文。1878年哈佛設置了「現代語文」（後稱之為「現代文學」）的榮譽學士學位，修讀者必須熟稔法文和德文，並且英文、法文和德文的課程得各修讀兩門通過，同時選擇一位作家作為研究對象並通過考試，才能獲得學位。4年後，哈佛才成立英文的榮譽學士學位，修讀者必須通過6個科目的考試，其中一項是作文（Grandgent, 1930: 72）。1891年，哈佛將原先分立的系所納入學院（division）統理，並由柴爾德（Francis James Child）擔任院長，希爾（Adams Sherman Hill）任英文系主任。<sup>36</sup>雖然語文學、文學和作文是哈佛英文

---

致了文化分析取代了文化介入，成為批評工作的核心。批評事業，在專家之學的光環中，退守學院，因而失去改變社會的號召力（2017: 17）。

35 趙毅衡指出，「瑞恰慈數次留在中國執教，對中國情有獨鍾；燕卜蘇在西南聯大與中國師生共同堅持抗戰，戎馬倥傯中，靠記憶背出莎劇，作為英語系教材，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則傳奇」（2009: 2）。1950、1960年代，夏志清、顏元叔等赴美求學時，與新批評家，如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亦多所交往。他們引介與應用的新批評，更在臺灣蔚為風潮，直至1980年代。

36 柴爾德（1825-1896）是美國學者、教育家和民俗學者。他最有名的著作是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民謠選輯，一般又稱「柴爾德民謠」。在哈佛英文系創建之前，他是修辭與演講的講座教授，並於1876年成為哈佛第一位英文教授。希爾（1833-1910）是美國記者與修辭學者。他繼

系表列的主要教學任務，文學仍是主要關懷，教授作文的老師亦以文學專業為主；除了前述兩位外，還有研究美國文學、莎士比亞和歐洲文學傳統的溫德爾（Barrett Wendell）、哈佛學院首任的學生事務部主任（Dean of Men）、研究北美清教徒歷史的布里格斯（LeBaron Russell Briggs）、教授美國文學的培瑞（Bliss Perry）等學者。到了1929年，哈佛的英文系已經能夠開出23門全學分和60門半學分的課程，包括「英國文學歷史與發展概要」、「英國文學歷史與知識背景」、「英文聖經」、「美國文學」、「當代文學」以及「英國文學史」等重量級課程（Grandgent, 1930: 81）。

也是在1891年，美國比較文學的奠基者馬許（Arthur Richmond Marsh）加入哈佛，擔任比較文學助理教授，開設「歐洲古典研究史」和「中世紀比較歐洲文學」兩門課。此時比較文學尚未成系，因為馬許認為比較文學只是方法，而不是研究主題。直到其他學者，尤其是索菲德（William Henry Schofield）和白璧德（Irving Babbitt）陸續加入後，才開啟了哈佛的比較文學時代，吸引了一批中國學生——包括梅光迪、吳宓、湯用彤、梁實秋等人——前往就讀。這些師從白璧德，心向比較文學的中國學者，回國後在東南大學和清華大學，為中國的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並且圍繞著《學衡》雜誌形成了一個與新文化運動打對台的人文主義學派。尤其吳宓、梁實秋、朱光潛等一代五四學人，透過撰述、翻譯與教學，構築了二戰以前外文研究的根本框架；1949年之後，雖然吳宓、朱光潛等人留在大陸，五四一代的渡臺學者——如梁實秋、英千里、夏濟安等人——及他們的弟子，仍是模塑戰後臺灣外文研究的重要推手。

透過這些歷史回溯，我們可以看到源於西方的外文研究如何「落地轉譯」：一方面浪漫主義文學觀的傳布，本身即暗含了英國對殖民擴張的現代回應，這樣的文學觀以其現代性遮蔽了殖民脈絡，並隨著帝國擴張成為全球普世人文的核心組成，直到後殖民理論——特別是薩依德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與《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提出對西方中心論的批評以及去西方化的主張後，才掀起一波典範轉移，將殖民歷史與影響重新移回現代（和）文學的前景，至今未歇。美國學者克里力（Joe

---

柴爾德，接任哈佛的修辭學教授，並負責大一作文的課程改革。

Cleary) 就指出，二戰後英美帝國勢力消長，但英語優勢和英文系在大學裡地位不減反升；尤其美國獨霸後，培養了許多來自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不僅促成了「全球英語」(global English) 的出現，更使英文系在非西方世界獲得重視的程度更勝於本土人文，這也成為當前英美英文系危機的歷史根源(2021: 143-144)。另一方面，透過留學，外文學人雖然幾乎同步見證了西方文學研究的發展，乃至對西方人文精神的衰頹有親身的體會，但是在國家積弱、民族情緒高漲的本土情境中，他們主要的關切其實不在西方，而在腳下的土地與自身繼承的傳統如何更新、面對現代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外文研究一方面促成了「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sup>37</sup>在亞洲的發展(因為西方即現代、現代即進步、進步需國族這樣的思路)，另一方面又成為本土化的先鋒，以西方的眼光構築自身，而陷入了自我東方化的漩渦，乃至在與離散社群的連繫與鏡像中，陷入全球文明階序的矛盾裡。連繫起自我東方化與西方主義的是殖民／現代世界體系的桎梏，這也是外文研究，在回顧與展望之間首先必須面對與反思的前提。

### 三源匯流：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

文學不過是人之活動的一種發露，而此發露不能單獨取自由的途徑，事實上其勢力及於別種活動之上，同時又受別種活動的影響。因此，欲論某件文學的暗示之原因結果時，僅置文學的潮流於眼中，而置別種活動於不顧，便難為完全的研究了。自這點所看的文學，是社會現象之一，故始與旁的社會現象關聯，盡明其自動、反動，始能知之。因此，一切歷史家，同時非為文學史家不可，而一切文學史家，也非為一般歷史家不可。

——夏目漱石(1931: 377)

37 西方主義，作為東方主義的反面，指的是東方人如何構築一個想像的西方。相關討論與應用，可參考Carrier, 1995; Chen, 1995; Corinil, 1996; Ashika, 2003; Buruma and Margalit, 2005; Venn, 2000以及王銘銘，2007。

本書將從清末「西學東漸」的歷史開始，去勾勒外文研究的真實狀況與變化軌跡。這包括了西學中譯的實踐、同文館的建制、傳教士與教會學校的貢獻，乃至外文研究作為一個學科與機構建制的出現，以及清末民初種種引介外國文學、建立現代中國文學的嘗試。由此出發，是因為臺灣現代學術體制的建立，與國府遷臺的歷史事實有著因果關係。沒有1945年的光復與1949年後的國府遷臺，臺灣戰後人文學科的發展必然不是今天的樣子；同樣的，沒有戰前大陸學人在思想與文化積累所形成的學術規模，戰後臺灣的外文研究也是無以想像的。然而，由於臺灣獨特的歷史際遇，戰前臺灣的外文研究亦有日本的影子，只是隨著日本戰敗與撤離而逐漸消聲匿跡。如何重新理解日據時期臺灣外文研究的狀況，及其與戰後臺灣學術傳統的相接與斷裂，當是理解臺灣歷史以及外文研究的殖民現代性的重要側面。同時戰後臺灣在社會與文化上的深遠轉變，尤其在冷戰結構之下，向西方——主要是美國——引介知識與生產學術的方式，亦形塑了戰後人文學科的發展，乃至在冷戰終結之後，仍然餘音不絕，成為批判學術無法迴避的問題意識與情感結構。是故，我們必須從西方、中國大陸和日本三個源頭入手，去梳理百年來臺灣外文研究發展的軌跡。

這個想法受到楊儒賓老師的啟發。在《一九四九禮讚》，他提出了「雙源匯流」的說法，來解釋1949年給戰後臺灣學術帶來的分裂與編成。他認為，百年來，臺灣的人文學術經歷了「中日雙源頭—雙源匯流—在地轉化的三階段發展」，並以「一九一一、一九四九與一九八七三條年線作為功能性的區隔」（2015: 122）。所以，要理解臺灣人文學科的發展，我們不能獨厚戰後的成果而忽略日本的影響，因為二次大戰前中、日兩國的知識成果為臺灣戰後人文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國府遷臺所帶來的學術建制與知識規模尤其深刻影響了臺灣的人文學術，是「在『納中國於台灣』此一格局下，台灣的人文學術環境才有機會發生急遽的變化」，尤其文化財的引入、學術人才的加入和學術機構的大量增生，為1949年之後的臺灣人文學術增加了寶貴而獨特的資源（2015: 111-112）。他強調，「中華民國—台灣一體化使得台灣的人文研究第一次明顯地有主體性的地位，這個主體性自然是在台灣成長起來的，但它卻是由一九四九的三大因素灌溉進來的，爾後又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紛爭中提供了一種另類華文文化的對照組」（2014: 116）。特別是解嚴後，本土化、兩岸化與國際化的發展亦對臺灣的學術定位造成衝擊，使得在地發聲成為解嚴

後臺灣學術的明顯特徵，既對雙源的作用有所呼應，亦與具有區域特殊性的東亞論述有所扣連（2015: 136-137）。

對照戰後臺灣的政治與文化發展，臺灣外文學門之「外」與自身被殖民的經驗就形成了寓意豐富的對照，這也使得戰後臺灣外文研究的發展，必然折射了臺灣政治與文化的主體性想像，並在知識與思想的層次上，介入了戰後臺灣的認同與主體政治，而成為一道獨特的思想風景。其中，冷戰在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效應，成為限縮外文研究（以及更廣泛的人文學科）的隱形框架：從新批評、現代詩、現代主義，乃至神話批評，外文研究的種種範式處處可見冷戰的痕跡。雖然東亞的冷戰效應，並未自1989年與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的垮台一同消失，但是，1980年代以降各種理論的奔放與流傳，或許可以視為韓裔人類學家權憲益（2006）所謂「冷戰崩解」（Cold War decomposition）的徵候，反映了一種從知識上瓦解冷戰結構的欲望（陳光興，2006a），因而迎來了各種各樣的西方左翼理論（從後現代到後殖民而全球化），企圖藉著「落地轉譯」西方知識來達到改造自身社會的目的。在這個意義上，形塑戰後臺灣外文研究的力量不只來自於中國大陸與日本兩個源頭，更直接來自於西方，尤其冷戰以來，大量留學生歸國任教，乃至進入政府部門工作，這才是引進西潮、模塑臺灣外文研究最為根本的力量。因此，如何看待西方文學與思想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流轉及效應，乃是這本書最根本的關懷；但同時，這種在地主義的歷史觀並非理所當然，它也必須被歷史地看待與反省。

是故，在研究方法上，本書對歷史材料（例如清末民初，與外國文學課程與學門設置相關的奏折、行政命令、教育規範，乃至系所的課程、師資、教材；在報紙和刊物上與外文研究相關的辯論；學生的論文以及學者的論著，乃至學科的建制敘事）進行梳理與解釋，同時也試圖重建相關討論的歷史脈絡：殖民現代性、冷戰歷史與政治以及全球化的影響，都是本書歷史化外文研究發展的論述架構。而所謂的「歷史化」，在精神上，服膺文化研究將問題脈絡化的要求，並且採取法國年鑑學派重視「長期發展」（*longue durée*）的主張，將研究問題放置在較為巨觀的歷史進程中，強調一種互動而整全的歷史過程以及知識生產的政治性與社會性。雖然從表面上看，外文研究有很明確的指涉對象，但其知識實踐的歷史實況無疑溢出了學門的想像，並涉入其他的領域，例如現代中國文學、民族認同與政治、臺灣文學，乃至於亞洲歷史與兩岸情勢。

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化」本身也是一種跨領域的研究取徑，目的在於為紛雜多變的知識實踐提供一套解釋的邏輯，並據以提出對學科發展走向的評價與省思。此外，由於學門建制史的資料零散不全，許多的歷史文件不復可得，外文學人對自身系所教學與課程的經驗與反省也不多見，因此，本計畫也部分仰賴口述訪談，以記錄行將消失的歷史，並且以外文學人的個人經驗，作為理解與反思外文研究的素材。因此，各種的追思文集、回憶錄、自傳書寫，乃至散文創作，都是關鍵的線索。

結構上，在緒論之後，本書分為三個部分進行敘述與討論。第一部分「外國文學的移入與轉化」，包括兩章：第一章討論從清末同文館至民初大學外文系的建制歷史，以及西方文學中譯的作用，並以吳宓的藏書以及民初學人的西方文學研究為例證，來說明民初外文研究的大致樣貌與重要辯論。第二章聚焦在臺北帝國大學時代的西洋文學講座，梳理當時的高教建制與學生刊物、臺北帝大英文科學生的畢業論文，以及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去思考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作為建構和想像臺灣及其文學的基礎，以說明西方文學研究如何作為「比較的幽靈」，介入了臺灣文學史，乃至民族想像之中。第二部分「冷戰分斷：（新）人文主義的流轉」，共分三章，大致涵蓋1949-1987年臺灣外文研究的發展。除了對學科建制加以介紹外，第三至五章主要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分別聚焦在夏濟安、侯健和顏元叔三位重要的學者，來討論（新）人文主義的思潮如何在冷戰結構中，透過外文研究發展和擴散，又如何1980年代漸漸式微。第三部分「理論年代：外文研究與後冷戰形構」，含括三章，分別討論1980年代後臺灣外文學界較為重要的幾個發展：第六章「創造『主體性』」討論後結構思潮與文學理論的引介與落地，尤其是源於精神分析的理論思考如何引發了關於臺灣主體性的辯論，乃至演變成發展臺灣理論的期待和焦慮；第七章「重新表述與接合」介紹文化研究在臺灣的興起，以思考西方理論、社會變遷（特別是弱勢社群的浮現）以及「情感」如何在外文研究中作用，鬆動與推進外文研究的邊界；第八章「外文之『外』」則處理臺灣至今方興未艾的族裔文學研究，尤其是亞裔與非裔美國文學以及所謂的「新英文文學」，如何從面對他者的倫理問題出發，思考族裔研究在外文學門中發展的歷史與意義，挑戰自由人文主義的局限，重構外文之「外」的想像。最後一章「結語：讀外文系的人」，則從比較個人與感性的角度總結全書的討論，補充歷史敘述的不足，

並向林文月先生致敬，因為她那篇名文〈讀中文系的人〉，其觸發點恰恰是一位外文系學生的提問。附錄收錄了2000-2020間的外文學門族裔研究相關之碩博士論文清單，記錄學門晚近發展的一個側面。

必須說明的是，雖然本書的主題是「外文研究」，但討論的對象主要集中在臺大外文系的課程與師資。這是因為臺大外文系在戰後，不論是課程設置、文學運動，還是社會介入或學術創新，都是關鍵的障地；在建制上，它也最具規模，並透過師資的移動與活動，深刻影響著臺灣各大外文系的教研發展。當然，這也成為本書最大的局限，未能充份觀照到其他語種和領域的發展與變化。因此，《落地轉譯》討論的不只是生硬呆板的「建制史」和「學科史」，同時也是外文學人的「思想軌跡」與「生命書寫」。但是臺大外文系並非一成不變和鐵板一塊，其學術傳統也不是自古皆然，而是在多重歷史因緣中的匯流、斷流、分流與逆流；由此，我們得以看到由西而東、經民初、日殖、冷戰至今的外文研究，總是在延續中有斷裂、在傳承中有異變。以臺大外文系為經緯不是為了「代言」或「壟斷」臺灣外文研究的全貌，而是以之為關鍵接合點，展開分析和批評。因此，雖然本書討論外文研究發展的百年歷程，但它更想藉著強調「思想軌跡」與「生命書寫」轉向一種「系譜」（genealogy）的思考，來鬆動「百年史」之類的源起敘事，以突出不同時代狀況對外文研究的影響。

在〈尼采、系譜、歷史〉中，傅柯（Michel Foucault）提到，系譜並不反對歷史，但拒絕「表達理念與不確定目的的後設歷史操作」，更反對「『源起』的追索」（1977a: 140）。他認為，追索系譜的目的是要鬆動源起的敘事，反思遺留（*herkunft/descent*）的意義，以揭露權力對歷史與真理的操弄，重建我們對歷史真實的認識。他寫道：

系譜並不假裝要回到過去，去復原那在遺忘物件的流散之外未曾破損的連續性；它的責任不是要展示過去仍積極地存在於當下，並藉著將所有的變動放入一個預先決定的形式裡，秘密地發揮作用。系譜與物種的演化並不相同，也無意圖繪人類的命運。相反的，它追隨遺留複雜的發展，將發生過的事件放入適當的流散之中；這是為了辨識意外，微小的偏移——或相反的，完全的翻轉——那些催生了持續存在並對我們有所價值的錯誤、

誤判和失算；這是為了發現真理或本體〔being〕並不存在於我們所知或所是的根底，而在於意外的外部性。這無疑是為什麼每一個道德的源起，自它不再虔誠的那刻起就具有批判的價值，而這是遺留永遠做不到的事。（1977a: 146）

傅柯強調，遺留或遺產，不是一種繼承與所有，而是「由錯誤、縫隙和異質層構成的不穩定集結，它會從內、從下威脅脆弱的繼承者」（1977: 146）；同樣的，「興起」（*entstehung/emergence*）也不是歷史發展的最終形式，而是一種偏移或裂變。因此，系譜這個概念想要突出的不是有始有終的，具有延續性與目的性的敘事，而是要指認各種各樣的「臣屬系統」（*systems of subjection*）：那「不是意義的預期力量，而是宰制的危險遊戲」（1977a: 148）。<sup>38</sup>

不過，本書並沒有像傅柯在《規訓與懲罰》裡那樣展開一種全然系譜式的考掘；相反的，溯源的衝動處處可見，那是因為外文研究至今仍沒有一部完整的歷史，有的只是異質而不完整的檔案、豐富但不確定的記憶，以及零星散落的紀錄和說法。非但外文研究的建制源起——不論在英國、日本、大陸或臺灣——本就與殖民歷史相嵌，而不純粹；比較文學的想像亦總是東西糅雜，彼此難分；理論、文化研究與族裔文學的發展更充滿了鏡像的折射，跨界糾結。因此，外文研究或許也是傅柯所說的，由意外、錯誤、縫隙和異質構成的不穩定集結，在這個變動劇烈的當下，也不一定具備道德的優位性或正當性。但作為一份遺留和遺產，它們具有批判的價值，既會從思想的內部和歷史的底層威脅意外的繼承者，亦可能因時代的變動而瓦解和佚失，隱沒在下一個歷史地層之中被遺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書藉著副標題裡的「軌跡」一詞，強調外文研究移動的路徑，可辨的發展，而不是朝向某個目標的演化，關鍵是牽引軌跡的力量以及內在生發的動力。是故，軌跡也是一種系譜敘事的標記，在抗拒整全的歷史解釋的同時，辨識歷史變化的過程並予以詮釋，在飄移、反覆，甚

38 傅柯的系譜概念取自於尼采，與中世紀的系譜觀大相逕庭，見Spiegel, 2001。系譜概念貫穿傅柯的著作，在1976年的演講集《社會必須被保衛》中有進一步的闡釋，並在後期作品，如《規訓與懲罰》和《知識／權力》中有所體現。見Foucault, 1977b; 1980; 2003。

或矛盾糾葛的軌跡中去說明源起的意外與不純粹、影響路徑發展的多元角力，以及殖民現代性的內在衝突。作為歷史紀錄的一種，軌跡承認歷史有其承續與延異；唯有如此，任何關於斷裂和異變的宣稱才不是任意妄為的權力意志使然，才不是某種開天闢地，自古始之的神話，才可以在歷史中被充分解釋、反駁、解構與重述。這也是為什麼本書從殖民現代性的角度切入，著重外文研究在各個歷史時期的變化和發展，如何受到政治的影響，以勾勒學術與社會的互動，而不只是追蹤學科自身跨越時地的延續，儘管某種學術傳承與人文關懷仍然清晰可辨。

聚焦戰後臺灣外文研究的思想進程，如何介入冷戰與內戰的雙戰構造，又如何透過「西方理論」與臺灣社會的政治轉型進行互動，本書也希望在學院建制與社會文化的連動中，考察外文研究如何思考與想像西方，從而展開一個植基於在地歷史，卻具跨國視角的文化批判。這個文化批判計畫始於對自身歷史的同情理解，並以學院與社會的連動為進路，展開何謂西方與如何反思西方的思索，因為自西學東漸以來，不論大陸或臺灣，在學術、文化乃至於社會想像上，無不以西方為依歸。然而，我們鮮少深入思考西方的意義，尤其是深藏於我們自身文化中的西方主義以及自我東方化的衝動，如何在方方面面主導了我們對學術與社會的認識。因此，批判地展開我們對「西方理論」或「歐美研究」的認識，超克內在的西方主義，當是外文研究百年思索重要而深刻的任務。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所面對的不僅是臺灣的外文學門與研究社群，也面向華人世界與西方更廣泛的人文學科，希望在追索學科建制與思想軌跡的同時，也對知識生產結構中的殖民／現代性展開反省，推動殖民之後的人文想像。

具體而言，外文學門歷史化的探究其實是一種歷史意識的鋪墊，是追逐西方諸神百年後的一次回歸。它要求我們認真看待前輩們走過的路，嚴肅對待他們的思考與心情，批判性地總結他們的經驗與方法，以走出一條屬於我們的路。唯有透過這樣的嘗試，我們才可以暫時脫離西方學術觀點與術語的夾纏，回歸在地的文化與思想脈絡，清理過去紛雜、甚或凌亂的足跡。同時，建制史研究的困難除了凸顯學門歷史紀錄的匱乏與重要外，也提醒著我們重新思索學科的意義。學科究竟是一個規範性範疇還是經驗性範疇？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學科專業化之前的跨學科知識生產，並將之轉化與吸納為學門發展的養分？在這麼一個「以外為尊」的學門裡，我們可不可以鼓勵後繼者去檢討和反省這條學

術路線，接納他們「既中且外、東西不分」的學術實驗？最重要的，回顧百年思潮起伏，我們是否可以走出、甚或擱置師輩的權威和包袱，批判地認識與繼承他們的成就、困惑與失措。我相信，這樣的破立之舉才是思考百年人文發展最重要的使命。

從文學翻譯，經比較文學，再到文學理論、文化研究與族裔文學，外文學門走過百年洪流，總是在複雜的政治情勢中曲折前進，在中外文化的疆界上持續溝通、轉譯與比較的工作，以打通學科邊界、重塑知識主體，再造人（與）文的意義與形象。尋思百年，外文研究仍有許多未竟之功，但是走過歷史的荊棘漫漫，我們至少可以看見它存在的條件與價值，在溝通中外、重建文明的道路上不斷挺進，興滅繼絕，改造自身。